

# 1

## 礼 貌

礼貌是首要的美德，或许也是一切美德之源。它同时也最贫乏、最肤浅、最有争议：它仅是一种美德吗？无论如何，是小小的美德，正如人们谈论有礼貌的夫人们一样。礼貌不在乎道德，道德也不在乎礼貌。一个彬彬有礼的纳粹分子，能使纳粹主义有什么改变？能使纳粹的恐怖有什么改变？当然是毫无改变，而礼貌的特征完全能用这个毫无改变来表示。纯形式的美德 礼仪式的美德 用以炫耀的美德！因此它是一种美德的表象，而且仅仅是表象。

人们不能否认礼貌是一种价值，然而这是一种暧昧的和有缺陷的价值。因为它掩饰

最好的或最坏的事物，因而它几乎是可疑的价值。这种形式上的做作大概掩盖着某种东西，然而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把戏，而人们不相信一切把戏。这是一种装饰，而人们对各种饰物都表示怀疑。狄德罗在某处提到过大人物们的“侮辱性的礼貌”而同样也应该想到许多小人物的阿谀奉承的或奴颜婢膝的礼貌。人们会更喜欢一言不发的蔑视和毫不矫揉做作的顺从。

还有更恶劣的。一个有礼貌的坏蛋和另一个坏蛋同样卑鄙，也许比他还要卑鄙。是出于虚伪？值得怀疑，因为礼貌并不以道德自居。何况彬彬有礼的坏蛋通常都厚颜无耻，为此他既不乏礼貌又恶毒透顶。那么他为什么要刺激别人呢？是为了形成对比？也许如此。然而在一种美德的外表和美德的缺乏（虚伪就是如此）之间没有对比，因为假定这个坏蛋是确有礼貌的，再说只要显得有礼貌也就足够了。在一种美德的外表（就礼貌而言也是它的真实，因为礼貌的存在完全消耗在它的显示之中）和其余一切美德的缺乏之间，在一种美德的外表和各种罪恶的或者不如说惟一现实的罪恶即恶毒的存在之间，早就形成对比了。孤立地看对比，它与其说是道德的不如说是审美的：与解释恐怖和谴责相比，它更能解释惊讶和诧异。对此要补充的一点在我看来属于伦理范畴，礼貌使坏人更为可恨，因为它表明他受过教育，而没有这种教育的话，他的恶毒几乎还可以原谅。彬彬有礼的坏蛋与一只猛兽相反，而人们是不会怨恨猛兽的。他也与一个野人相反，而人们是会宽恕野人的。他与笨拙、粗俗、没有教养的莽汉相反，后者当然是可怕的，但人们至少可以用没有文化、生性粗暴和智力有限来解释。彬彬有礼的坏蛋不是一只猛兽，不是一个野人，不是一个莽汉：他相反地有教养、受过教

育、举止高雅，而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认为他不可原谅。咄咄逼人的莽汉，谁能知道他是坏人还是仅仅不懂礼貌？对于经过精心挑选的拷问者，则相反地毫无疑问了。正如鲜血在洁白的手套上更为显眼一样，恐怖在变得文明的时候才更加可怕。据说纳粹分子，至少是其中的某些人，最善于扮演这种角色。人所共知，德国的无耻行为，有一部分就是在野蛮与文明、暴力与礼仪混合的情况下，在时而彬彬有礼时而兽性大发的暴行中进行的。然而它们始终是残酷的，而且或许由于彬彬有礼而更应受到谴责，由于形式上的人道而更不人道，由于文明而更显野蛮。一个粗鲁的人人们可以指责他是畜牲、愚昧无知、没有教养，把过错归咎于他童年的磨难或社会的失败。一个有礼貌的人则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礼貌成了一种加重罪行的情节，它直接地谴责了人类，无论是民族还是个人；它谴责的是社会的成功而不是失败，因为社会愈失败便愈能得到谅解。人们所说的很有教养，这句话确实说明了一切。纳粹主义被视为德国社会的成就（雅恩凯列维奇 [Jankélévitch] 会补充说：这也是德国文化的成就，不过也许只有他或者他的同代人才胆敢这么说），而这就是对纳粹主义也是对德国的评价，我是指这个在军营里演奏贝多芬的乐曲，同时却在屠杀儿童的德国！

我离题了，但并非粗心大意，而是出于警觉。面对礼貌，重要的首先是不要上当。礼貌不是一种美德，也不可能代替任何一种美德。

不过为什么说它是首要的、而且或许是一切美德之源呢？看起来很矛盾，其实并非如此。一切美德的起源不可能是一种美德（因为若是如此这种美德本身也要有一个起源，而它不可能有这个起源），而且就美德的本质而言，首要的也许不是有道德的。

为什么是首要的呢？我按时间顺序来谈谈个人。新生儿没有道德，也不可能。婴儿以及幼儿在很长时间里也大抵如此。与此相反，他很早就发现的东西是禁止。“别干这个：这是脏的，这是不好的 这是难看的 这是凶恶的……”或者“这是危险的”，他很快就分清了恶的（错误的和造成伤害的 危险）错误是人类特有的恶，是不会造成伤害的恶（至少对于犯错误的人是如此），是没有直接的或内在的危险的恶。可是为什么要禁止犯错误呢？因为这是脏的、难看的、凶恶的……对孩子来说，行为先于权利，或者不如说，权利只是一种行为，和另一种行为一样。有些事情是允许的，有些事情是禁止的，有些能做，有些不能做。善？恶？有规则就够了，它先于判断并且是判断的依据。可是规则除了习俗之外没有别的依据，除了习惯和对习惯的尊重之外没有别的理由：行为的规则，纯形式的规则，礼节性的规则！不要说粗话 不要打断别人的话 不要拥挤 不要偷东西 不要撒谎……所有这些禁止对于孩子都是一样的“这不好”，在伦理和审美之间的区别是后来才逐渐形成的。所以礼貌先于道德，或者不如说道德最初只是礼貌：服从习惯（社会学家们在这里显然有理由反对康德），至少首先是他们有理（这一点康德也许不会怀疑），服从既定的规则、服从一切表象的规范化的规定——服从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规矩。

康德说，人们不可能从习惯的事情中推论出应该习惯的事情。而孩子在最初几年里正是不得不这样做，并且只有这样才成其为人的。此外，康德还认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成其为人，他只是被教育造就的那个样子”，首先是教育“把兽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 德国哲学家。——译注  
康德《论教育》导言，弗兰出版社，1980年 第73页。

性变成人性'<sup>①</sup>。不可能说得更精彩了。使用先于价值，服从先于尊重 模仿先于责任。因而礼貌“它不是产生的”先于道德（“它是不可能产生的”）后者只能逐渐形成 就像一种内心化的礼貌 摆脱了一切表象和利益 完全集中在礼貌所不需要的意愿之中。但是，如果最初没有礼貌，这种道德怎么能够出现呢？文雅的举止先于并且导致善良的行为。道德犹如一种心灵的礼貌，一种自我约束的礼仪（即使它尤其是事关别人的），一种内心生活的礼节，一种我们责任的法规，一种最重要的仪式。反过来说，礼貌好比一种身体的道德，一种行为的伦理，一种社会生活的法规，一种并不重要的仪式。康德说是“纸币”不过它总比没有强，而且取消它去用真正的金币，也同样是愚蠢之极。是“零钱”他也这样说，它只是美德的表象，却能使美德变得可爱。若是没有这种表象和这种可爱，哪个孩子会变成有道德的人呢？

因此道德——通过礼貌——从最底部开始，而且它也完全应该开始了。任何一种美德都不是天生的：所以必须变成有道德的人。但是，如果还不是个有道德的人的话，怎样才能变成呢？亚里士多德解释说：“凡是需要学了才做的事情，我们是在做的同时学习的。”然而没有学过怎么去呢？这里有一个圈子，只有通过先天的推理或者通过礼貌才能跳出来。可是先天的推理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礼貌则不然。亚里士多德接着说：“我们正是在从事公正的行为时变得公正，在从事温和的行为时变得温和，在从事勇敢的行为时变得勇敢。”但是不公正的人怎么能公正地行动？不温和的人怎么能温和地行动？不勇敢的人怎么能勇敢地行动？而且从哪时候起怎样变呢？亚里士多德似乎回答说，通过习惯，但是这个答案显然是不够的：习惯必须以

在它之前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无法对那种存在作出解释。康德进一步启示我们，他用训练、也就是一种外部的强制，来解释最初的这些对美德的模仿：孩子由于缺乏本能而自己得不到的事情，“应该由别人为他去做”，所以才“一代人教育另一代人”<sup>①</sup>。当然如此。然而在家庭里，这种训练如果不首先是尊重习惯和规矩的话，那又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强制的，不如说是起规范作用的训练，追求的不是秩序而是某种可爱的社交性——不是警察的，而是礼貌的训练。正是通过这种训练，在模仿美德的各种方式时，我们也许可能成为有道德的人。拉布吕耶尔<sup>②</sup>指出：“礼貌并非总是来自仁慈、公正、好意、感激，它至少给它们以表象，使人在外表上显得好像他内心果真如此一样。所以它在成年人身上是不够的，在孩子身上是必不可少的。这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是一个开端。说‘请’或‘对不起’是装作尊重，说‘谢谢’，是装作感激。尊重和感激便由此开始。好像自然模仿艺术一样，道德模仿礼貌，礼貌模仿道德。康德承认：“对孩子们讲责任是白费力气”<sup>③</sup>，他说得很对。但是谁会因此而放弃教他们礼貌呢？没有礼貌，我们又能从我们的责任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如果能够成为有道德的人——只有做到这一点，道德甚至不道德才成为可能——这也是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美德，是为了形式而不是为了善，是通过礼貌而不是道德——通过对习惯而不是对价值的尊重！道德起初是一种把戏，后来是一种人为现象。人是在模仿美德时成为有德之士的，康德写道：“由于人们扮演这些角色，美德在被他们长期当作谨慎采用的表象之后，逐渐显

① 康德《论教育》导言第 70 页。

② 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法国作家，著有《性格论》。

③ 康德《论教育》第三卷第 129 页。

露出来并进入了他们的举止之中。”礼貌先于道德，并使道德有可能产生。康德说是“炫耀”，但它含有教诲的意义。问题在于首先要采用“善的方式”当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要通过这些方式来达到它们模仿的东西——美德，而它只有在模仿它们时才能产生。康德还写道：“别人身上的善的表象，对于我们并非没有价值：从这种掩饰的把戏——它想受到它也许不配的尊重——中可能产生严肃的东西，否则道德就不可能传给每一个人，也不会每个人身上形成。”“精神状态来自与它们相似的行为”，亚里士多德说。礼貌就是这种美德的外表，一切美德都由此而来。

这样礼貌在为道德的出现，甚至部分地为它的充分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的时候，把道德从这个圈子里拯救了出来（没有礼貌，就必须是有道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与一个只是好心、恭敬、谦虚……的人之间在许多场合下区别都微不足道：人最终类似于他模仿的东西，而礼貌则不知不觉地导致——或者能够导致——道德。所有的父母都懂得这一点，他们就是这样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我完全理解礼貌不是一切，也不是最重要的。用通常的话来说，无论如何要有教养，首先是要有礼貌，这说明了许多问题。为了使自己的孩子说“请”、“谢谢”、“对不起”而让他们重复一千遍“我说什么，一千遍要多得多……），如果仅仅是事关礼貌，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除非是有怪癖或冒充高雅。但是在这种训练中，也让他们学会了尊重。“训练”这个词让人不高兴，我很清楚，可是谁能避免这种事情呢？靠爱不足以培养孩子，甚至不足以使他们变得可爱和多情。靠礼貌也同样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两者兼顾。在我看来，一切家庭教育都是在尚未成为道德的最微小的美德，与已经不再是道德的最高尚的美德之间进行的。剩下的是学习语

言。但若是如阿兰 所认为的那样，礼貌是符号的艺术，那么学习说话也是属于这一范畴。这始终是习惯和尊重习惯，它只是因为愈受尊重才显得愈好。《正确的惯用法》可以作为一本礼仪手册的标题，而这正是一本相当著名和生动的、格雷维斯的语法书的标题。做习惯的事情，说习惯的话……人们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谈到纠正，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它只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和惯用的礼貌。美德和作风是以后才产生的。

因此 礼貌不是一种美德 而是在成年人身上 模仿美德的外表，或者（在孩子们身上）是在为美德作准备，在这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它即使不改变性质，至少也改变了意义。它在童年时代是最重要的，在成年时期是不重要的。除了一个恶毒的成年人之外，还有什么比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更糟糕的呢？然而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能够去爱、判断、希望……能够有美德，因而能够有爱，而礼貌不可能代替它们。一个慷慨的粗人总是比一个有礼貌的自私者好。一个粗野的老实人要比一个文雅的无赖好。阿兰多次说过，礼貌只是表情的一种体操；这充分说明它出自肉体，而重要的当然是心灵或灵魂。有一些人，他们的礼貌好得让人不放心，令人不安。这时人们就说：“过分礼貌就不老实”，因为老实往往会使人不高兴，冒犯人和得罪人。再说即使是老实人，也有许多在一生中都被文雅的举止所束缚，只是隔着礼貌这层——从来都不是完全透明的——玻璃出现在别人面前，似乎已经一劳永逸地把真实和礼貌混淆在一起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将就”的作风里，就有许多这样的成分。过分认真地看待礼貌，它就与真实性相反。那些派头潇洒的人，就像过分听话的大孩子，成了规矩的俘虏，上了习惯和礼仪的当。他们失

① 埃米尔·阿兰(1868—1951)，法国哲学家。——译注

去了青春，而人们是要经过青春才成为男人或女人，青春使礼貌变得微不足道，它不需要一切习惯，只喜欢爱情、真实、美德、美妙、神奇和粗野！成年人将会更宽容、更明智。不过归根结底，如果绝对必须在两种不成熟之中选择的话，从道德上来说，与其做一个过于顺从而长不大的孩子，不如长久地做一个青少年；与其过于礼貌而不诚实，不如过于诚实而不礼貌！

礼仪不是生活，礼貌不是道德，但又并非毫无意义。礼貌是为大事作准备的小事。这是一种礼仪，不过没有上帝；是一种仪式，不过没有信仰，是一种礼节，不过没有君主。空洞的形式正是由于这种空洞本身它才有价值。自负的礼貌、自视甚高的礼貌、自以为了不起的礼貌，是被形式愚弄的礼貌，由此它就违背了它规定的规则本身。礼貌是不够的，而自负则是不礼貌的。

礼貌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素质，而且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素质。从它本身来看，它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几乎毫无意义：与美德或智慧相比，它什么也算不上，而这一点正是礼貌在它优雅的保留之中，也应该善于表现出来的。然而聪明而有道德的人并未免除礼貌，这一点也是非常清楚的。爱情本身不可能完全免除形式。这正是孩子们应该向他们的父母学习的，这些父母是多么爱他们——尽管太过分了，尽管并不好——却又不断地责备他们，不是在内容上，谁敢对自己的孩子说：“你爱我爱得不够”？而是在形式上。哲学家们将会讨论，以便弄清楚首要的形式实际上是否并非一切，区别道德和礼貌的是一种幻想还是别的什么。有可能一切都只是习惯和对习惯的尊重——一切都只是礼貌。可是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爱就不是这样，还有温和，还有怜悯。礼貌不是一切，而且几乎什么都不是。不过人也一样，几乎是一种动物。

## 2

## 忠 诚

过去已不再现，未来尚未到来：遗忘和出其不意是自然界的现象。年复一年，有什么比春天的来临更出其不意？又有什么被忘却得更快？重复本身是如此动人，但只是一种圈套：因为季节都忘了它们是重复的，重复使大自然永远常新，但它本身正是大自然极少革新的原因。一切真正的革新，一切真正的创造，都要以记忆为前提。柏格森看到了这一点，他为此虚构了一种世界的记忆（持续时间），但是这种记忆将是上帝，所以它不存在。大自然忘了成为上帝，或者上帝在大自然里忘了自己。如果有一部世界史的话——

①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译注

当然是有一部的——这就是一系列混乱的或走运的出其不意，没有（哪怕是出其不意的）计划，也没有记忆。它与一部作品相反，或者只是碰巧才做成功的，是一种不大可能的和没有结果的爵士乐即兴演奏。因为这些延长或重复本身只有在变化中才突然产生，而没有任何东西开始后是不会结束的。易变是规律。遗忘是规律。现实时时刻刻都永远常新，而这种完全彻底的新颖，这种持久的新颖，就是世界。

大自然是伟大的健忘者，也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物质的。物质就是遗忘本身，只有精神才有记忆。因而像它有过第一句话那样，像它不断地有话那样，也是遗忘才会有最后一句话。现实是存在的第一句话，这个永恒的第一句话。它怎么会想说些什么呢？然而孩子王（时间）并不口吃：它不说话也不沉默，不虚构也不重复。易变，忘却，纯洁；一个孩子的王国！变化是不忠诚的，甚至连季节都是朝三暮四的。

但是还有精神；但是还有记忆。影响很小，时间很短：这种脆弱性就是精神本身。它在人的心里必然要消失——然而由于它保留的回忆，精神却是生气勃勃的！精神是记忆，也许它只是记忆。思考，就是回忆他的想法；希望，就是回忆想要的东西。当然，并非只能思考同样的想法，也不是只能希望想要过的东西。但是一种没有记忆的虚构会是什么样子呢？一种没有记忆的决定又会如何呢？正如肉体是现在的现在一样，精神是过去的现在，具有现在这个词的双重意义：过去留给我们的，以及保留在我们身上的。这就是圣·奥古斯丁<sup>①</sup>所说的“过去的现在”，而这就是记忆。精神由此开始。忧虑的精神，忠诚的精神。

忧虑是对未来的记忆，我们总是离不开它。这是它的本性，

奥古斯丁（354—430），罗马帝国基督教思想家。——译注

或者不如说是我们的本性。除了智者或疯子之外，谁会忘记他的未来呢？而除了恶人之外，谁会只担心自己的未来呢？当然人是自私的，但也不像人们往往以为的那么绝对：即使没有孩子的人，也在为后代人操心，这种忧虑是高尚的。有人不为自己抽烟担心，倒在为臭氧层的空洞而不安。对自己毫不在乎，而在为别人担心，谁还能去指责他呢？人们总是很少忘记未来（倒是会忘了现在！）也就更不会对其一无所知了。

过去已一去不返。未来使我们担忧、烦恼不已；它的虚无就是它的力量所在。相反，对于过去，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也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这无疑不能说完全不对。伊壁鸠鲁对此有一句格言：在时间的风暴里，记忆是深深的港口……不过忘却是一个更安全的港口。如弗洛伊德所说，神经官能症患者为模糊的回忆所苦，差不多就应该靠忘却来维持精神的健康。诗人写道：“上帝提防人类忘记了遗忘！”而尼采也看清了生活和幸福是在哪一边：“正如动物所证实的那样，几乎没有记忆也可能生活，并且活得幸福，但是没有遗忘便不可能活下去。”记住这句话。然而活着是目的吗？幸福是目的吗？至少就这种生活和幸福而言？应该羡慕动物、植物、石头吗？即使有人会羡慕它们，那么应该服从这种愿望吗？精神还会剩下什么呢？人性还会剩下什么呢？难道只应该以健康或卫生为目的？“卫生的”思想，既有它的力量也有它的局限。即使精神会是一种疾病，即使人性会是一种灾难，这种疾病、这种灾难都是我们的——因为它们就是我们，我们只有通过它们才存在。对于过

- ① 伊壁鸠鲁（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古希腊哲学家。——译注
- ②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译注
- ③ 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译注

去，不要打个落花流水。人的全部尊严在思想里；思想的全部尊严在记忆里。容易忘却的思想，这也许是思想，但是没有精神。容易忘却的欲望，这无疑是欲望，但是没有意志，没有心愿，没有灵魂。科学和动物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尽管并非全部动物（据说有一些是忠实的），也许并非全部科学都是如此。这没什么关系。人只是由于记忆才有精神，由于忠诚才有人性。人啊！不要忘了你的记忆！

忠诚的精神，这就是精神本身。

我兜了个大圈子来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它的范围极广。忠诚不是一种普通的价值，不是一种普通的美德，而是通过它和为了它才有价值和美德。没有正直者的忠诚，还会有什么正义？没有爱好和平的人的忠诚，还会有什么和平？没有自由思想者的忠诚，还会有什么自由？而没有诚实人的忠诚，真实还会有什么价值呢？当然，它还会同样真实，然而是没有价值的真实，从中不可能产生任何美德。没有遗忘就没有健康，也许如此，但是没有忠诚就决无美德。卫生或道德。卫生和道德。因为问题不在于什么都不忘却，也不在于对随便什么都保持忠诚。仅有健康是不够的，圣洁也不能强加于人。“问题不在于显得崇高，只要忠诚和严肃就够了。”<sup>①</sup>这就是问题所在。忠诚是记忆的美德，而记忆本身也犹如美德一样。

然而是什么样的记忆呢？或者是对什么的记忆？还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有些什么限制？我们再说一遍，问题不在于对随便什么都保持忠诚，否则就不是忠诚而是嗜古、迟钝的顽

弗拉基米尔·雅恩凯列维奇《不受时效约束的》，瑟意出版社，1986年，第55页。

固执拗，守旧盲从……任何美德都反对两个极端，一个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会这样提醒我们：一个是三心二意，另一个就是固执，它们与忠诚都格格不入。介于两者的正中间？也可以这么说，但决不像不大热心的人或无聊的人所理解的那样（问题不是要有点三心二意又有点固执！）。用靶心来表示这一概念，比我们议会里的中间派更为恰当。我说过是两个深渊之间的一条山脊。忠诚既非摇摆也非固执，正因为如此它才是忠诚的。

那么它本身就有价值？是为了它自身、由于它自身才有价值？不是，或者不仅仅是。最能显示其价值的是它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大致这样说过，人不会像换衬衣那样换朋友，而忠诚于自己的衣服，则与对朋友不忠诚同样可笑。除非是像这位哲学家在别处说过的那样，“他们过分邪恶”。忠诚不能任意用作借口：对于坏人坏事的忠诚比背弃更为恶劣。纳粹党卫队宣誓忠于希特勒，这种对罪行的忠诚是有罪的。忠于恶是不道德的忠诚。雅恩凯列维奇指出：“对愚蠢的忠诚是一种更愚蠢的行为”<sup>①</sup>。这里有必要——这是小学生的、甚至是倔强的忠诚——更多地引证这位大师的话：

忠诚是否值得称赞呢？这要“看情况而定”，换句话说：这取决于忠诚的价值。忠于什么？（……）谁都不会说怨恨是一种美德，却牢记着他的仇恨和愤怒。不忘耻辱是一种有害的忠诚。既然事关忠诚，这个形容词不就是一切吗？可是还有一种对鸡毛蒜皮的忠诚，也就是斤斤计较，念念不忘琐碎小事，固执地反复念叨，罗唆个没完……因此我们

弗·雅恩凯列维奇《论美德》第二卷，《美德和爱》弗拉马里庸出版社，1986年再版第140页。

所要的不是任何忠诚，而只是善意的忠诚和高尚的忠诚。①

也就是说：深情的忠诚，有道德的忠诚，意志坚强的忠诚。仅仅记住是不够的。何况人可以忘却但并非不忠诚，也可以不忠诚但并未忘却。说得更确切一些，不忠诚必须以记忆为前提：人只能对记得的事情忠诚或不忠（一个遗忘症患者对自己的诺言是不会信守或背弃的），在这一点上，忠诚和不忠是两种对立的记忆方式，一种是有道德的，另一种则不是。忠诚是“‘同样’的美德”，雅恩凯列维奇还一再这样说。但是在一个一切都在变化的、世俗生活的社会里，人只有通过记忆和意志才会有同样。没有人能在同一条河流里洗两次澡，也不能对同一个女人爱上两次。帕斯卡尔说：“他不再爱这个十年前他爱着的女人。我完全相信：她不再是从前那个人了，他也不是。过去他年轻，她也一样，现在她完全成了另一个人。如果她还和从前一样，他也许还会爱她。”忠诚是“同样”的美德，由于它“同样”才能存在或不被遗忘。

既然我今天不再和昨天一样，我为什么还要信守前一天的诺言？为什么？是由于忠诚。按照蒙田的看法，这就是人的同一性的真正的基础：“我的存在和我的同一性的基础纯粹是道德的，它存在于我向自己发过誓的对信仰的忠诚之中。实际上我和昨天的我不是同一个人；我之所以还和昨天一样，是因为我承认自己是同一个人，因为我按自己的看法，把某一段过去看成是我的过去，还因为我打算在将来也承认我现在的诺言，并把它永

① 弗·雅恩凯列维奇《论美德》第二卷，《美德和爱》弗拉马里庸出版社，1986年再版第140—142页。

②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法国哲学家、作家。——译注

远看作是我的诺言。”<sup>①</sup> 没有对自我的忠诚，就没有有道德的人。而忠诚正是由此产生的，否则就不会有责任可言！也正因为如此不忠诚才有可能：由于忠诚是记忆的美德，不忠诚就是记忆的错误（不如说是它的缺陷或丧失）。回忆不代表一切，好记性并非永远都好，准确的记忆并不总是充满深情或尊重别人。记忆的美德不止是记忆；忠诚也不止是准确。与忠诚对立的不是遗忘，而是毫无意义或谋求私利的三心二意，是背弃，不讲信义，变幻无常。然而它又确实与遗忘对立——正如任何美德与其攀登的斜坡对立一样——不忠诚则相反地以遗忘而告终：人起初背叛他记住的东西，然后忘却了他背叛过的东西……不忠诚就这样把自己消除在它的胜利之中，而忠诚始终只能在拒绝消除自己时得到暂时的胜利（我的意思是说，它除了与遗忘或背弃进行永无止境的斗争之外不知道别的胜利）。雅恩凯列维奇写过绝望的忠诚，我当然不会因此去责备他。因为“遗忘是不可抵抗的海潮，久而久之将淹没一切；而记忆则断断续续地进行绝望的反抗，两者之间的斗争并非势均力敌。主张宽恕的人在建议我们忘却的时候，是在建议根本用不着建议的东西：健忘者自会忘记，他们只求如此。需要我们怜悯和感激的是过去，因为与现在和将来的自卫不一样，过去不是在独自抵抗……”<sup>②</sup> 这就是记忆的责任：对过去的怜悯和感激。要成为忠诚的人，就要承担这种艰巨的责任、要求严格的责任、不受时效约束的责任。

这种责任当然有各种程度。在我刚才引证的段落中，雅恩凯列维奇想到了纳粹的集中营和犹太民族的牺牲。绝对的牺

马塞尔·孔什《蒙田和哲学》梅加爾出版社 1987 年 第 118—119 页。

弗·雅恩凯列维奇《不受时效约束的》，第 60 页。

牲：绝对的责任。我们无须以同样的程度来忠于我们的初恋、或使我们在童年时欣喜若狂的自行车赛冠军……忠诚应该与由不可计量的性质所显示出来的崇高价值相称。首先是忠于苦难，忠于无私的勇气，爱情……我产生了一个疑问：苦难也成了一种价值？从它自身来看当然不是，或者只是消极的价值，苦难是一种痛苦，把它看成赎罪是在欺骗自己。但苦难如果不是一种价值的话，一切苦难的生活却由于它需要的或应得的爱而成了一种价值。爱受苦受难的人（基督教徒的慈悲 佛教徒的怜悯 斯宾诺莎学说信奉者的同情……）比爱美丽或高尚的东西更为重要。价值不是别的，只是值得被爱的东西。所以一切忠诚——无论是忠于一种价值或者一个人——都是对爱的忠诚，也是通过爱产生的忠诚。忠诚就是忠实的爱，这句老生常谈没有说错，或者说只是在爱情方面弄错时（即把它不适当地仅限于夫妻关系）才会出错。不是说一切爱情都是忠实的（所以忠诚不能归结为爱情），但是一切忠诚都是深情的、一贯的（对仇恨的忠诚不是忠诚 而是积怨或狂怒）因此它才善良 因此它才可爱。因而忠诚就是不同程度地忠实于忠诚！

至于具体的领域，那就不胜枚举了。请允许我只是非常简要地提及三个方面 思想、道德、夫妇。

有一种对思想的忠诚，这是显而易见的。人们不会什么都想，因为什么都想就不再是思想了。诡辩派用起来极为方便的辩证法本身，只是一种忠于它的规律、它的需要，甚至它承担和超越的矛盾的思想。萨特<sup>①</sup>说过：“不要混淆辩证法和思想观点的闪光。”忠诚大致上就是区别它们的东西，正如人们

① 让 - 保尔·萨特 (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译注